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 制度变革》研究课题 主报告（讨论稿）

## 中国经济增长动因

——跨世纪的回顾与展望

王小鲁 执笔

### 说明

本报告是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 制度变革》11 篇专题报告和 3 篇背景报告（目录附后）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它是集体劳动的成果。目前这一稿还是讨论稿，仍然比较粗糙，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执笔者对其中的错误负主要责任。

除了以上各专题报告和背景报告作者对本报告的贡献外，都阳担负了本报告的一部分数据准备和模型分析工作。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 制度变革》是由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组织进行的。本课题得到了德国阿登纳基金会和中国改革基金会的资助。

本课题由王小鲁、樊纲负责，课题组成员有蔡昉、杜方利、樊纲、贺力平、黄晓京、孟连、王小鲁、夏小林、武剑、张晓晶、周天勇。

乔桐封、朱赛妮、李爱莉为整个研究课题做了大量工作。

此外，在各专题报告的写作过程中，余永定、易纲、陈锡文、温铁军、米建国、等许多学者曾参加过讨论并提出过宝贵意见和建议。

课题组对所有以上提及的和未提及的、为本课题作出了贡献的个人和组织表示感谢。

###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 制度变革》课题专题报告目录

蔡昉、王德文：《中国经济增长：劳动力、人力资本与就业结构》，1999。

樊纲：《论体制转轨的动态过程》1999。

贺力平：《国内市场需求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1999a。

贺力平：《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1999b。

孟连、王小鲁：《对中国经济增长统计数据可信度的估计》，1999。

王小鲁：《农村工业化与经济增长》，1999。

王小鲁、夏小林：《城市化与经济增长》，1999。

武剑：《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1999。

夏小林：《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与非国有经济》，1999。

张晓晶：《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稳定增长》，1999。

周天勇：《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1999。

###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 制度变革》课题背景报告目录

杜方利：《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其因素分析》，1999。

黄晓京：《日本战后经济增长与制度变革》，1999。

黄晓京：《韩国经济的兴旺与危机》，1999。

# 前言

中国在自 1978 年开始的经济改革时期，经历了 20 年经济高速增长。统计数据显示，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从改革前（1953-1978）的 6.1% 提高到改革期间（1978-1998）的 9.7%。人均 GDP 增长率由改革前的 4.0% 提高到改革期间的 7.8% 或 8.3%（国家统计局 1999，世界银行 1996，1997a）。表 1 提供了这两个时期的分部门增长率比较。

尽管对已公布的经济增长率是否准确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本文后面将对此进行考察），但改革期间经济增长明显加快、大多数中国人生活水平大幅度改善，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也得到了国内外经济学界广泛的承认。是什么导致了经济增长的加速？这种高速增长仅仅是由投入增长带动的短期现象，还是可持续的长期趋势<sup>1</sup>？本报告的目的是评价中国改革二十年来经济增长的整体状况，分析导致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判断这些因素的剩余潜力，并且研究今后可能制约经济增长的内部和外部因素，从而对中国在 21 世纪初叶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作出判断。

在众多的增长因素中，有以下几点特别值得注意：

1. 改革期间储蓄率提高，国内投资增长加速。
2. 改革期间，特别是自 90 年代以来，海外投资大量增加。
3. 改革期间发生了大规模的生产要素重新配置，估计有 1.7-1.8 亿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和城镇就业，无疑极大地改善了资源配置状况，推动了经济增长。此外城市经济中也发生了劳动力、资本和人力资本跨所有制、跨部门、跨地区转移。
4. 由于引进市场竞争和物质利益原则，企业和劳动者提高了微观经济效率。
5. 改革期间由技术引进和创新带来的技术进步有所加速。
6. 对外开放和市场导向使我国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对外贸易超常增长。

以上几点，又可分为要素投入、改革效应、结构变化效应、外部环境因素这 4 个方面。本文的分析将从这 4 方面进行。其中有些方面有所交叉，但并不影响分析。

本报告结构如下：

## 1. 要素篇

国内储蓄与投资

外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劳动力和人力资本

土地与水资源

## 2. 制度篇

非国有部门对增长的贡献

体制转轨：国有与非国有经济

市场环境 with 体制障碍

## 3. 结构篇

农村工业化：正在减速的增长源泉

城市化与经济增长

需求结构变化与增长方式转换

## 4. 环境篇

国际环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

<sup>1</sup> 见 Solow 1956, Lucas 1988, Romer 1986 关于增长理论的文献，以及世界银行 1993, Krugman 1994, 和 Martellaro 1996 关于东亚和中国经济增长的争论。

## 5. 综述篇

未来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城市化、结构调整与制度建设

表 1 改革前和改革时期的分部门增长率比较

| 平均增长率  | 1953-78 | 1979-98 |
|--------|---------|---------|
| GDP    | 6.1     | 9.7     |
| 农业     | 2.1     | 5.0     |
| 工业和建筑业 | 11.0    | 11.7    |
| 服务     | 5.5     | 10.5    |
| 人均 GDP | 4.0     | 8.3     |
| 外贸     | 9.5     | 14.8    |
| 出口     | 10.0    | 15.8    |
| 进口     | 9.1     | 13.6    |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1999。

### 一、要素篇

#### 1. 国内储蓄与投资

##### 高储蓄和高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改革期间，随着储蓄率的提高和市场导向的投资机制变化，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由 1953-78 的 6.2% 上升到 1978-98 年的 11.8%（均已折算为不变价格）。资本形成明显加速。

根据我们的初步计算，以不变价格计算的资本存量增长率在改革以前 25 年间（1953-1978）平均为 6.2%，而在改革 20 年间（1978-98）平均上升到 9.5%。这对经济增长无疑发挥了强有力的带动作用。按照资本弹性为 0.4 计算，改革期间的物质资本增长使经济增长加速了 1.3 个百分点。

改革期间的资本形成加速，除消除了“大跃进”和文革的消极影响以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国内储蓄率（国内最终消费与 GDP 之差占 GDP 的比重）的持续上升。在改革前储蓄率从 1952 年的 21% 持续上升到 1978 年的 38%，改革期间进一步提高。从图 1.1，如果排除 50 年代末期到 60 年代的大起大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内储蓄率持续上升的趋势，在 1978-88 年期间，储蓄率在 32%-38% 的高位波动，此后继续上升，1992 年以后基本保持在 40% 以上，1997-98 年为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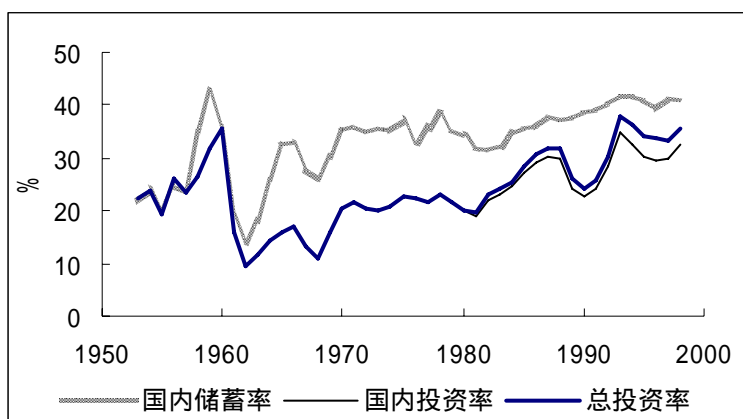
居民收入绝对水平的提高，是导致储蓄率上升的主要因素。改革以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按可比价格计算提高了 2-3 倍，同时储蓄率也分别由 8.9% 上升到 20.2%（城镇居民，1985-1998）由 13.4% 上升到 26.5%（农村居民，1978-1998）。这说明城乡居民的边际储蓄倾向是递增的（国家统计局 1998, 1999。此外见武剑的专题报告：《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1999；贺力平的专题报告：《国内市场需求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1999a）。

居民储蓄的增长集中体现在居民银行存款的增加。居民储蓄已成了银行资金的主要来源。1980-1998 年期间，全部银行存款从区区 1600 亿直线上升到 9.5 万亿，其中居民储蓄的比重从 17% 上升到了 56%。现在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银行资金已取代了政府财政预算的位置，成为仅次于企业自筹资金的一个主要来源（国家统计局 1998，1999）。

改革 20 年来居高不下的国内储蓄率保证了这期间的高投资。图 1.1 比较了国内储蓄率

和投资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 的比重）的变化趋势。它显示了两者的相关关系，说明储蓄率的上升拉动了投资率。但从 1978 年以来储蓄率和投资率曲线之间距离明显缩小了（1989-91 年例外），显示了投资率更快的上升，从改革前 60-70 年代的不到 20% 上升到 1992 年以后的 30% 以上<sup>2</sup>。这说明改革期间有更多的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而不象计划经济时期那样变成大量积压的存货。

图 1.1 国内储蓄率和投资率（占 GDP 比重）



注：国内储蓄率=1-最终消费/GDP。国内投资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利用外资)/GDP。总投资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GDP，包括外资投入。1980 年以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无数数据，根据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推算得出。假定后者占前者的比重在 1953-54 年为 0.5，1955-57 为 0.6，1958-79 为 0.75。50 年代苏联援助未能从国内投资中扣除，故该时期投资率可能偏高。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1998，1999，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 1997。

### 投资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了资本形成

改革前的 60-70 年代，从储蓄到投资、再到资本形成的转化，效率极低。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计划体制下不考虑市场需求的盲目生产和计划失误，造成短缺和产品积压并存。积压产品经常占国民总产品的很大份额，并大量报废，致使大量储蓄不能转化为有效投资（参见科尔奈：1980）。另一方面，按照计划安排的投资项目经常由于计划失误造成报废，因而使投资的相当部分不能形成固定资产。

改革期间，投资体制发生了重要变化，市场对投资的引导作用逐渐加强，使资本形成效率有了明显提高。表 1.1 计算了改革前（分为 50 年代和 60-70 年代两个时期）和改革时期各自的国内储蓄率、国内投资率、国内资本形成率（分别定义为国内储蓄、投资、新增固定资产对 GDP 的比率，这 3 个指标是根据投资与储蓄的比值、和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计算的。对后者进行了修正，见表 1.1 的说明）。在改革前的 1961-77 年间，储蓄率平均为 GDP 的 30%，而转化为投资的部分只有 18.5%，形成固定资产的部分只有 12.6%。这反映了惊人的浪费。改革期间，储蓄率上升了 7.4%，投资率上升了 8.3%，资本形成率上升了 9.6%。这说明从储蓄到投资、从投资到形成固定资产的环节，效率都提高了。为了反映投资的综合效率，表中最后一行设计了一个称为“综合资本形成率”的指标。它等于最后形成的固定资产额与储蓄额之比，反映每百元储蓄最后形成了多少固定资产。从表中可见，该比率从改革前的 42.1% 上升到了改革期间的 59.4%，表示每百元储蓄中有 59 元形成了固定资产，比前一时期多形成了 17 元固定资产。其余部分有 28 元变成了增加的存货，有 12 元在投资中损失了。

<sup>2</sup> 改革前的平均投资率低下同 1958 年“大跃进”后带来的经济困难，以及随后的十年文革有直接关系。在 1961-69 年期间，投资率从其他年份的 24-25% 降低到 14% 以下。

综合资本形成率的上升说明了明显的投资效率提高。但同时，它也显示投资中仍然浪费严重，还有进一步提高的巨大潜力。

**表 1.1 储蓄率、投资率、和资本形成率**

|                  | 1953-60 | 1961-77 | 1978-98 |
|------------------|---------|---------|---------|
| 国内储蓄率 (GDP=100)  | 28.6    | 30.0    | 37.4    |
| 国内投资率 (GDP=100)  | 27.0    | 18.5    | 26.8    |
| 资本形成率 (GDP=100)  | 25.0    | 12.6    | 22.2    |
| 投资/储蓄 (储蓄=100)   | 94.5    | 61.6    | 71.8    |
| 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        | 78.9    | 66.7    | 80.2    |
| 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 (修正)   | 92.6    | 68.3    | 82.8    |
| 综合资本形成率 (储蓄=100) | 87.5    | 42.1    | 59.4    |

注：各时期不同比率是该时期各年比率的算术平均。对 80 年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计算见图 1 注。1980 年前资本形成率主要依据了国有企业基本建设投资的固定资产形成数据。表中 53-60 年的数据较好，主要是由于未能将苏联援助从国内投资中扣除，因而与以后时期不可比。

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交付使用的新增固定资产/固定资产投资，反映有多少投资形成了固定资产（与 100% 之间的差额是投资中的损失）。由于未考虑从投资到形成固定资产的时滞问题，因而使用该指标衡量投资效率会产生误差。因此在表中对它进行了修正。由于缺乏数据，我们假定 50-70 年代（截止到 1978 年）投资项目平均周期为 2 年，改革时期由于“短平快”项目大量增加，平均周期缩短到 1 年，投资时滞取项目周期的中值（1/2）。固定资产交付使用修正值=固定资产交付使用原始值  $\times$  [（该时期平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指数/投资品价格指数-1） $\times$  以年为单位的投资时滞+1]。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不同年份。

根据上面的计算，在改革期间国内资本形成率提高的 9.6 个百分点中，1/3 来自储蓄率的提高，2/3 来自资本形成综合效率的提高。这说明市场导向的投资体制变革提高了从储蓄到资本形成的转化效率，加速了资本存量的增长。<sup>3</sup>

对我国资本存量的初步计算显示，改革期间年均资本增长率由过去（1953-78）的 6.2% 提高到 9.5%，上升了 3.3 个百分点。根据模型分析的初步结果，如果按照资本、劳动、人力资本的弹性系数分别为 0.4 : 0.4 : 0.2 计算，那么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 2.5 个百分点左右上升到 3.8 个百分点左右，上升了约 1.3 个百分点。扣除 0.3 个百分点的外资贡献，储蓄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大致有 0.3 个百分点，而投资效率提高的贡献占了 0.7 个百分点。

### 投资体制改革与增长潜力

我国的投资体制在改革期间发生了两个显著的变化。其一是投资主体的分散化，由国家投资为主转向了国家、地方政府、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多元投资的混合模式。其中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在相当程度上也受市场引导，尽管目标和行为方式与纯粹市场导向的竞争性企业有所不同。其二是融资方式的变化，由政府财政主导的直接融资变成了国有银行—企业自筹双轨式融资（另外参见武剑：1999）。

但这两个变化并不说明在投资领域已实现了市场化的改革。从表 1.1 可以看到，尽管改革期间资本形成率比改革前有了重大提高，但实际上投资效率仍然很低，每年存货增加的部分仍占到总储蓄的 28%，投资损失占总储蓄的 12%。假设今后投资体制进一步改革可以使前者减少到 20%，后者减少到 8%，那么综合资本形成率就能从过去 20 年的 59% 提高到 72%。那样，即使储蓄率下降到 31%，仍能保持现有的资本形成率不变。

投资低效率的原因可以大致归纳如下：

首先，投资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配严重偏离市场导向。表 1.2 说明，1998 年国有及国

<sup>3</sup> 在以往的增长研究中，一般都未将这两种对增长的贡献相区分。这方面的制度变革贡献被忽略了。



有控股工业仅占工业总产出的 28.5%；但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单位占了 55%。国内非国有企业（集体和个体）占工业产出的 57%，却仅占投资的 26%。根据计算，1997 年国有企业资本的边际产出率仅为 0.104，是非国有企业平均投资效率的 1/14（见武剑：1999）。这种投入和产出结构主次关系倒置的情况持续存在，说明投资违反了市场导向，资源配置人为地向低效率部门倾斜。这应当是投资效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迄今为止作为融资主渠道的国有银行系统并没有完成商业化。银行之间只有有限的竞争；利率不反映金融市场供求关系变化；银行还担负着支持国有企业的任务，因而形成了巨额坏债。而在经济活动中更为活跃的大量中小型非国有企业却没有正常的市场融资渠道以获得必要的投资资金。

**表 1.2 不同投资主体占工业产出份额和占投资份额的比较（1998）**

|      | 国有   | 非国有  | 其中：<br>集体 | 个体   | 其他   |
|------|------|------|-----------|------|------|
| 工业份额 | 28.5 | 71.5 | 38.3      | 18.9 | 14.3 |
| 投资份额 | 55.0 | 45.0 | 13.1      | 12.8 | 19.1 |

注：工业份额为占工业总产值的份额，其中“国有”为“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投资份额为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份额。“其他”主要是股份制及外商投资企业。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1999。

上述情况如果持续下去，必将造成资源的大量耗费，削弱中国经济增长的实力。同时这说明，投资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将给经济增长提供巨大的潜力。

投资体制改革需要考虑以下几方面的任务：

第一，政府进一步退出竞争性的投资领域，集中精力搞好有外部效应的公共部门投资；

第二，加强投资主体的风险约束机制，完善信息、科研、知识产权服务与管理，优化投资质量和结构；

第三，推动国有银行商业化，改变银行资金按所有制倾斜分配的经营环境；

第四，开放金融领域的公平竞争，发展非国有银行（特别是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地方性银行）；培养风险投资机制。

### 对国内储蓄率变动的估计

目前我国 40% 以上的储蓄率是一个相当高的比率。根据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高速增长时期的经验看，保持 30% 或高于 30% 的储蓄率是一个重要条件，但很少超过 40%（见杜方利的背景报告：《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其因素分析》，1999）。

从近几年的情况看，我国储蓄率居高不下与预期收入不确定性关系很大。市场不景气，以及失业、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住房分配制度、教育制度等与市场化相关的改革措施相继出台，使人们普遍感受到了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加储蓄以防范未来的风险。根据武剑（1999）的模型分析，预期收入不确定是导致储蓄上升的首要因素，占全部影响因素的 32%。其他因素依次为收入增长（18%）、通货膨胀率（17%，负相关）、经济货币化程度（9%）、贫富差距扩大（7%）、名义利率变动（7%）、资本市场发展（5%）等。

由于上述这些不确定因素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将继续存在，储蓄率在今后 5-10 年内不大可能大幅度下降。在较长时期，随着新制度的逐渐完善、人们对风险的心理承受能力提高、以及收入提高、市场状况改善，储蓄率在 10 年后下降到 30-35% 是可能的。

更长期的因素是青年一代消费观念的变化和未来的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消费负担加重。目前和未来的青年一代消费欲望会强于他们的上一代。人口老龄化问题将在 2020 年以后出现

(见蔡昉、王德文：1999)。这些因素可能使储蓄率在 2020 年以后有较大的下降，例如到 30%或更低。但从目前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香港等的情况看，储蓄率下降到 25%的可能性很小。

高储蓄率提供了维持高投资率和高增长率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这已被东亚经济增长经验所肯定。但另一方面，过高的储蓄率以牺牲当期消费为代价，在投资率受市场景气状况限制的情况下还可能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如果能够有效减少投资中的浪费，那么根据前面的分析，即使储蓄率降低到 30%，仍然有可能维持接近于过去 20 年的较高资本形成率，从而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

## 2、外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外资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增加，实际利用外资额从 1983 年的 19 亿美元上升到 1991 年的 115 亿美元，1992 年以后以增长加速到年均 30%，在 1997 年达到了 644 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 452 亿，大约是世界每年流向发展中国家外资总额的 30%上下（见贺力平的专题报告：《全球化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1999b；武剑 1999）。

根据初步计算，外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见表 1.3。

|                   | 全部资本 | 对资本存量和增长率的贡献 |       | GDP<br>% | 外资对GDP增长率的贡献 |       |
|-------------------|------|--------------|-------|----------|--------------|-------|
|                   |      | 内资(%)        | 外资(%) |          | 直接贡献         | 生产率贡献 |
| 存量 (10亿元, 1980价格) |      |              |       |          |              |       |
| 1978              | 534  | 100          | -     |          |              |       |
| 1992              | 2141 | 95.1         | 4.9   |          |              |       |
| 1997              | 3679 | 90.7         | 9.3   |          |              |       |
| 增长率 (%)           |      |              |       |          |              |       |
| 1954-78           | 4.2  | 4.2          | 0     | 5.3      | 0            | 0     |
| 1979-97           | 10.7 | 10.1         | 0.6   | 9.5      | 0.3          | 0.6   |
| 79-92             | 10.4 | 10.0         | 0.4   | 9.2      | 0.2          | 0.3   |
| 93-97             | 11.4 | 10.4         | 1.0   | 10.3     | 0.5          | 0.9   |

注：内资和外资均以全部资本存量为 100%。其增长率是它们各自对资本增长率贡献的百分点。外资对 GDP 增长率的直接贡献是根据外资占总资本的比重计算的，假定内、外资的产出弹性相同。生产率贡献包括两个内容：1)，其生产率高于内资的部分，2)，溢出效应，即其技术和管理的示范和扩散效应对国内经济的影响。

资料来源：生产函数估计结果、国家统计局（历年）。

根据上述结果，迄今为止，外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还是相对有限的，但对生产率提高的促进作用不容低估。今后 5-10 年，由于国内市场竞争加剧、通货紧缩、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余波，以及国际资本流动方式的改变（由直接投资设厂转向跨国企业购并），外资流入可能显著趋缓。在渡过了这一调整期后有可能重新加快（贺力平 1999b）。但即使短期内外国投资不增长甚至下降，外资给国内市场带来的竞争，以及由此产生的技术进步压力、技术和管理示范效应，仍然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对经济增长发挥积极的影响。

## 3. 劳动力和人力资本

中国作为一个劳动力大量剩余的国家，劳动力增长是否仍然对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在此之前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例如世界银行 1997、Jefferson 1992、Woo 1996 等等）

以及本项研究课题的专题研究（见蔡昉、王德文的专题报告：《中国经济增长：劳动力、人力资本与就业结构》），都各自通过计量分析发现劳动力的增长的确对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有几项研究还发现，改革期间劳动力在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重新分配，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有关后一个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详细讨论。这里只就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增长的变动趋势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一个简短的概述。

### 劳动力的变动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全国从业人员的数，改革以前 26 年（1953-78）劳动力年平均增长率为 2.56%，而改革以后 20 年（1979-98）平均增长率为 2.81%，相差无几。不过在改革前，1958 的大跃进和随之而来的“自然”灾害曾经造成了劳动力的大量非正常死亡和人口出生率的显著下降，否则劳动力增长率会高得多。改革后的劳动力增长可以分为两个时期：1979-90 年高达 3.95%，这期间的新增劳动力出生于控制人口之前的生育高峰期；而 1991-98 年仅为 1.14%，已经走出了受高出生率影响的阶段。考虑到 1990 年以后未作过人口普查，劳动力增长率有可能偏低，但由于有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作为依据，不至于偏离太大。因此我们根据主观判断将这一时期的劳动力增长率调整到 1.2%。

与以上情况相应，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 90 年代以前较高，而在 90 年代以来则显著降低。这个降低未必是坏事，否则我们在市场需求不振的同时，还将面临大得多的就业压力。

根据 80 年代到目前的人口出生率等数据，并基于劳动力参与率缓慢下降的趋势判断，今后 20 年间劳动力增长率将从 90 年代的水平继续缓慢下降。因此大致可以估计 2000-2010 年的年平均劳动力增长率为 0.9%，2010-2020 年为 0.5%，20 年平均的劳动力增长率为 0.7%<sup>4</sup>。

### 人力资本的变动趋势

人力资本缺乏准确的衡量指标。如果用新增从业人员中的大、中、小学毕业生人数作为衡量人力资本变动的尺度（按受教育年限加权），那么改革 20 年间人力资本存量的平均增长速度为 6.1%，大大低于改革前 12.8% 的增长速度。人力资本增长速度放慢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改革前的高速增长主要来自中小学教育的普及。在普及率达到一定水平后增长速度自然会放慢。其二，改革期间教育投入不足和使用效率低，及师资不足，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人力资本在改革期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初步计算为 1.2 个百分点，比改革前有明显的下降。今后人力资本的增长取决于教育等方面的投入。有希望加快，但不可能恢复到改革前的增长速度。

## 4、土地与水资源

土地和水资源不但制约着农业发展，而且也明显制约着工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在 1978-1995 年期间，耕地面积下降了 4.4%，耕地质量的下降幅度更大。北方水资源短缺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为了保护耕地，不得不采取了冻结占用耕地的措施。这一措施是否有效还有待观察。但某些地区的情况显示，一方面乱占耕地、浪费耕地的现象并未得到制止（常常与政府人员腐败现象相关），另一方面冻结措施又限制了某些正常的产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

小城镇发展战略应当重新考虑。鉴于小城镇人均占地面积远远高于大中型城市，片面强调以小城镇代替大中型城市的发展将导致多占用大量土地资源。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而土地资源非常稀缺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难以承受的代价（见王小鲁、夏小林的专题报告：

<sup>4</sup> 同时参考张二力、郭震威等：1998。张等预测劳动力增长率在 2000-2010 和 2010-2020 年间将分别为 0.6% 和 0.2%，20 年平均 0.4%。本文基于不同的参数估计作出略高的判断。



《城市化与经济增长》，1999）。

发展节水农业，实现南水北调，并使水价向影子价格靠拢以节约工业和生活用水，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总的看来，土地和水资源的使用都存在严重的短缺和严重浪费并存的局面。这种局面持续下去，将对经济增长构成威胁。解决的途径，中心是如何有效利用现有资源。包括土地资源的更经济有效的利用，

## 二、制度篇

### 1. 非国有部门对增长的贡献

#### 非国有企业对增长的贡献及回落趋势

改革前，国有经济占统治地位。在 1952-1978 这 26 年中，国有经济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 40% 提高到 80%，第三产业没有详细数据，但可以认为情况基本相同。只有农业未实行国有化，而是以集体化代之，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下降的。因此可以大致估计，国有经济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 50%。

改革中的一个最显著变化，就是非国有经济部门的高速增长（参见夏小林的专题报告：《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与非国有经济》1999；樊纲的专题报告：《论体制转轨的动态过程》1999）。特别是乡镇企业，年均增长率高达 20% 以上（根据当年价格增加值进行价格平减计算），占非国有部门的主体地位。农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尽管慢于全国 GDP 增长速度，但平均 5% 的年增长率仍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表 2.1 给出了改革期间非国有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变化以及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在 1978-97 年间由 44% 持续上升到 71%，占据了主导地位。改革期间无疑非国有部门对经济增长作出了最主要的贡献，在经济增长率中占了 3/4。而国有部门是改革期间唯一一个增长率下降的部门。因此可以说，改革期间经济增长的加速完全是通过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发展实现的。改革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化的制度变革的结果。

表 2.1 各部门对 GDP 的贡献

| 部门     | GDP 构成<br>(GDP=100) |      |      | 部门增长率<br>% |         | 对增长贡献<br>GDP 增长率=100<br>1979-97 |
|--------|---------------------|------|------|------------|---------|---------------------------------|
|        | 1952                | 1978 | 1997 | 1953-78    | 1979-97 |                                 |
| 国有*    | 19                  | 54   | 29   | 10.5       | 6.3     | 26                              |
| 城市非国有* | 29                  | 11   | 22   | 2.3        | 13.8    | 26                              |
| 乡镇企业   | -                   | 4    | 28   | -          | 21.8    | 35                              |
| 农业     | 51                  | 28   | 19   | 2.1        | 5.0     | 10                              |
| 其他     | -                   | 3    | 3    | -          | 9.2     | 3                               |
| GDP    | 100                 | 100  | 100  | 6.1        | 9.8     | 100                             |

注：各部门对增长的贡献根据其同初始年份相比的产出增量（不变价格）在 GDP 增量中所占份额计算。

\* 根据工业部门国有和非国有经济的比重估算得出。城市非国有企业包括外资企业。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1998，55-58，421，431-435。

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非国有企业的发展态势出现了明显的回落趋势（见夏小林，1999）。1998 年，集体所有制工业的增长率自 1990 年以来第一次回落到 10% 以下；个体、私营和其他类型的非国有企业自 80 年代以来第一次回落到 20% 以下。考虑到可能的数字不实，问题

可能比数字表现的情况更为严重。

### 农村工业化和集体企业的发展模式面临转换

改革早期，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主要以农村的乡镇和村办集体企业为主。1992 年以后，外资企业的发展明显加快。国内股份制企业 and 个体、私营企业也有了迅速的增长，但迄今为止总量至今仍小于集体企业，而且同外资企业相比经营环境还不够宽松，特别是仍然缺乏一个完善的法制环境。据国家统计局数字，1996 年乡、村集体工业仍占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 28%。

乡镇集体企业在改革中一枝独秀，有几个原因。

首先，当时市场发育不完善，要素市场未形成，城市经济中体制、政策障碍重重，缺乏非国有企业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乡村中计划控制薄弱，农业改革又先期突破：尽管硬环境较差，反而比较有利于非国有企业发展。

其次，即使在乡村，也还没有形成一个保证各类企业公平竞争、平等发展的制度环境。因此首先发展起来的是集体企业，也包括一些带着集体企业“红帽子”的个体、私营企业。

第三，特别在要素市场未发展起来的情况下，企业更需要地方政府和社区组织在要素和资源供应、信息提供、信用担保和产权保护等方面提供帮助。这是乡镇企业能够跨越最初的种种障碍而进入非农业生产领域的重要条件。

第四，乡村存在着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初始条件和动力。

第五，改革前长期的计划控制造成了大量的市场空缺；改革期间国有企业对市场缺乏反应，在竞争中缺乏动力；这些都给受市场导向、但自身素质较差的乡镇企业提供了发展的天赐良机，使其能以较低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产品质量在市场上站住脚。

最近 2-3 年来，非国有部门、特别是农村集体企业增长速度显著趋缓（见夏小林 1999），非国有部门投资下降幅度更大，自 1997 年以来已经连续 3 年低于国有经济部门。预示其在今后几年中发展势头不容乐观。

乡镇企业面临的困难一部分来自市场的变化。经过 20 年市场发展，短缺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低技术、低附加值、低质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正在面临激烈竞争的考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也使需求结构发生变化，需求档次正在提高。这些变化对企业的技术和人力资本投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预示着生产方式需要进行重大调整。种种迹象表明，过去支撑非国有部门增长的传统因素已经优势不再，潜力殆尽。今后增长需要新的动力。

## 2、体制转轨：国有与非国有经济

改革期间的经济高速增长始终伴随着非国有经济的迅速扩展。与之相比，国有经济除少数企业外每况愈下，国有企业的改革始终没有取得预期的进展。如果这种局面不能扭转，前者更大规模地取代后者就是必然的逻辑（樊纲 1999）。

不过，直到 90 年代中期，非国有经济的扩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了外部的发展，即通过农村工业化大量吸收农村劳动力和进行非农业积累，而国有经济则在产出和效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长时间保持（并扩大）了原有的就业规模和高于非国有经济的投资。从 1978 到 1995，国有单位就业人员从 7451 万增加到 11261 万，占全部从业人员比重仅略有下降。直到近年随着国有企业人员大量下岗，国有部门就业才发生了明显变化，98 年下降到 9058 万人。在 1981-1992 年间，国有单位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始终保持在 68%-69%，直到 1996 年才下降到 52.5%，而 98 年又回升到 55%。投资结构继续向国有经济倾斜。国有部门也仍然占有银行贷款的主要部分，而且造成了巨额银行坏债的主要部分。

因此，国有经济的状况仍然对整个经济前景举足轻重。如果国有企业问题不解决，迟早

要对经济增长构成拖累，甚至带来危险的经济震荡。解决以上问题主要有三种可能：

第一，国有企业重振旗鼓。国有企业“正规军”在改革期间败于非国有企业“游击队”，简单地说，主要是至今没有解决好如下问题：

- 1) 激励机制；特别是经营者的合法收入几乎不包含对其真实经营业绩的回报。
- 2) 惩罚机制；无论是经营者还是工人，干好干坏均无饭碗之忧。唯近年来工人下岗剧增，但管理者能否下岗仍不清楚。
- 3) 监督机制；放权让利给了经营者较大的权力，但同时也放松了监督。政府部门的监督与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监督相去甚远，而且给了政府工作人员寻租的机会。

国有企业改革只有在解决了以上问题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取得实际进展。

第二，简单过渡（见樊纲 1999）。维持现有局面，国有企业会继续逐渐收缩，更多地让位于非国有企业，让时间解决问题。这是一条难度较小的路，但危险在于可能维持更多的冗员，需要投入更多的政府补贴，造成更多的银行坏债，结果对经济造成更大的拖累。

国有部门不改革，社会对国有部门的补贴就难以减少，还会不断增加，不仅本身是资源的浪费，还阻碍着非国有部门的成长和整个经济的增长。甚至可能将困难积累下来，一旦爆发，将导致增长停滞、社会动荡。

第三，产权改革（樊纲 1999）。如果国有企业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不能取得上述突破，就需要进行所有制结构方面的改革，更多地通过非国有化打破僵局。问题在于如何在此过程中兼顾公平和效率。

国有企业不管是主动进行改革，还是被动地过渡，都意味着体制结构的重新调整和资源的重新配置，包括在国有和非国有经济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对于今后的经济增长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导向作用，减少对资源配置的干预和阻碍，通过优化资源配置继续推动经济增长。

### 3、市场环境 with 体制障碍

在本研究项目在山东、湖南、浙江、北京等地进行的大量企业调查发现，在面临疲软的市场和激烈的竞争时，许多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正在致力于开发和引进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提高产品质量，改善经营管理。他们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动力、才干、和学习新事物的能力，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企业技术进步潜力如果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可能会有力推动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

调查也发现，这种潜在的增长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压抑。这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 技术进步与融资约束

1998 年全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为 8.6 万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是由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这四家国有银行贷出的。这四家银行中，除了农业银行对非国有的农业和乡镇企业有较多贷款外（主要侧重于集体所有制企业），其他三家银行全部以国有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工商银行为例，截止到 1999 年 6 月 20 日，非国有企业在短期贷款余额中只占了 20.9%，其中大部分是集体企业。三资企业占 5.2%，而个体和私营企业仅占 0.54%。显然，这种倾斜的信贷结构是与非国有企业的发展状况不相称的，而且严重制约着这些企业、特别是国内个体和私营企业的发展。在温州调查中发现，尽管温州市非公有制企业已经占了全市经济的 90% 以上，而且比之国有企业有较好的信用<sup>5</sup>，但贷款难的反映仍然相当普遍。除少数已经发展到拥有几千万乃至几亿元资金、经营状况良好而且有不动产可用于

<sup>5</sup> 根据当地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提供的情况，该市国有银行约有 70% 的贷款提供给非公有制企业，而不良贷款只占国有银行贷款总额的 11%-12%，远低于全国水平。

抵押的企业不存在融资困难外（但这些企业往往不需要外部融资），相当大量中小企业有贷款需求但无法贷到。这其中不乏正在进行新技术、新产品开发，或有良好预期收益、急待扩大生产的企业。与此同时，银行有大量资金贷不出去。

根据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尽管大企业拥有从事新技术研制开发的雄厚实力，对市场反应灵敏、生气勃勃的中小企业是技术进步的主要原动力。许多成功的新技术都是首先由中小企业进行初步开发后，才转由大企业进行再开发和商业化生产的。这些初步开发需要外部资金支持，失败率较高，有高风险，但孕含着大量有潜在高收益的新增长点。因此，一个经济如果没有多元化的、市场导向的金融体制（特别是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和风险融资机制来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和新技术开发，就没有未来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我国目前迫切需要改革金融体制，打破所有制界限，逐步形成大中小并存、全国性和地方性并存、专业化和全方位服务并存、不同所有制并存的、以市场导向为主的金融体系。在这个过程中，规范金融市场、防范金融风险是非常必要的，但代价不应当是牺牲金融市场的发展。

上述情况当然也与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的素质有关。大量中小企业管理水平低，经营不稳定，帐目不全，逃废债务频繁发生。这些增加了银行贷款的风险。因此，通过提供教育和培训提高中小企业素质和管理水平，形成和完善对中小企业的社会化会计、审计、技术服务，是非常必要的。

### **政府收入与企业负担**

改革以来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步下降，从 1978 年的 31.2% 降到 1995 年的 10.7%，以后回升，但到 1998 年也只有 12.4%。这一下降趋势是放权让利的结果。但同时，各级地方政府和各个政府部门的种种不规范收费却直线上升，给企业和居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根据山东、湖南、浙江等省若干市县的调查，这些收费加上财政预算外收入，至少相当于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有业内人士认为，全国各地的政府管理部门收费，按较保守的估计可能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8%-10%。

这些费用项目大致用于三个方向：1），弥补政府财政收入的不足，用于维持政府部门的编制外人员开支。2），用于地方临时用途，例如为某些地方公共建设项目或政府楼堂馆所筹资。3），用于充实某些部门或小团体的小金库，实现某些政府工作人员的福利目的。

政府预算不足以养人，常常与政府机构臃肿相关。县级机构通常包括政府至少二十多个局、委、办；党委五、六个部、办；加上人大、政协的下属机构和武装部、工会、青年团、妇联，有 50 多个部门和单位，至少上千人规模。许多机构都各有扩大自身规模的动机，真正必须的业务量未必有多少。浙江某镇，政府编制 102 人，据当地一些企业领导人估计按业务量 50 人就够了，但实际有 400 多人，办公费用每月开支 80-100 万，仅月工资就超过 60 万元。每年镇财政预算 450 万，还不够需要的一半。其余部分，只能靠计划生育罚款、卖土地收入和其他各种收费维持。

靠收费进行的地方公共建设投资中也有相当数量用于建设豪华的办公楼、福利设施、购买轿车。由于收费不规范、不透明，还给政府人员获取非法收入提供了方便。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与政府机构事权不清、包揽过多有关。现在政府部门还在大量做着本该由企业和市场去做的事。例如规定企业产品不许提价或不许降价；规定服务企业该不该有最低消费标准；耗费人力物力进行许多徒具形式、劳而无功的检查、验收；以及其他种种不必要和不适当的干预。但是许多该由政府去做的事，包括提供公共服务、提供透明的法制环境、保护合法的市场经营和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等，却常常没有做好。

政府臃肿造成的收费，极大地加重了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再不精简机构、规范事权、规范政府收入，势将对经济增长构成严重威胁。

### **执法与腐败**

企业负担过重和经营困难，还往往与某些政府执法部门对企业的适当干预、歧视、侵权，和执法人员的腐败相关。

对部分省市的调查发现，改革 20 年后的今天，某些政府机关仍然不能改变过去任意对企业发号施令的旧习惯，转向主要为市场、为企业和居民提供服务。这类事例不胜枚举。某市卫生部门公然规定，对所有营业面积不足 30 平方米的个体经营餐馆一律视为卫生不合格，吊销卫生许可证。被吊销许可证的餐馆有几千家之多。某市为整顿市容，在拆除违章建筑的同时，大量拆除经政府部门批准经营的、包括与政府部门订有场地租赁合同的个体商亭和临街店铺，事前不协商，事后不赔偿、不安置。

由于市场化的推进，一部分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政府职能，例如物资和资金分配，已经走向消亡。这消除了许多政府工作人员以权谋私的可能性。现在留下的政府职能多属于无法市场化的部分，例如税收、司法、公安、环保、市政规划、土地管理等等。而执法人员滥用职权为自己寻租的现象却大量增加。相当多执法人员素质低、不懂法，甚至目无法纪、贪赃枉法。

调查发现，税务系统（特别是地税）工作人员收入明显高于其他政府部门人员收入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常常高出平均水平 2-5 倍。有些税务人员公开向企业出卖税收额度，以 20%-30%的比例索取回扣，到了耸人听闻的地步。有的地方劳动部门不向企业提供任何服务，却强迫企业按照从业人数交纳“劳动服务费”，不但加重了企业负担，实际上是对企业创造就业机会的惩罚。某市环保人员在不进行检测的情况下，强迫企业按全部机床拥有量交纳噪声超标罚款，以此要挟企业招待吃饭、旅游、游览色情场所。有些企业估计，每年总产值的 5-10%要用于应付政府执法人员。

这种情况造成了扭曲的市场和严重的不公平竞争。企业可以通过行贿逃税和逃避其他监督。那些从事正当经营的企业经营者也常常要被迫行贿，并丢开企业正常业务，花费大量时间和费用去招待、陪同那些执法者出入娱乐场所。合法经营受到阻碍，违法行为却畅行无阻。这些已到了必须改变的地步。否则将极有可能激化社会矛盾、扼杀经济增长。

### **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

另一个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市场秩序混乱。拖欠和逃废债务，对合法所有权的侵害，是目前司空见惯的现象。企业新技术开发的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仿冒、侵权屡禁不止。这对企业正常经营和技术进步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有些企业经营者说，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不搞技术开发是等死，搞了技术开发是找死。因为你投了资，别人得利。

当前我国经济正面临一个提高生产的技术含量、靠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的转折点。在此情况下，保护合法财产所有权和知识产权，对下一步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 **三、结构篇**

在经历了 20 年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现在面临来自几个方面的重大的结构转换挑战。

### **1. 农村工业化：正在减速的增长源泉**

#### **制度变革与要素配置优化**

中国改革期间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变化是，20 年间有 1 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部门，使乡镇企业部门取代了国有工业部门的位置，成为工业中的主要组成部分。这是迄今为



止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村工业化过程。因此，尽管因素众多，农村工业化成了这 20 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见王小鲁的专题报告：《农村工业化与经济增长》，1999）。

除此之外，这 20 年间，特别是 80 年代末期以来，有大约 5-6 千万农村劳动力暂时地或相对稳定地转移到城市部门就业，主要是在非国有部门就业，为后者的发展补充了大量劳动力（参见农业部 1995、1996，劳动部 1997，周其仁 1997，Wang 1999）。

在城市经济部门内，也有一定数量的工人、技术和管理人员从国有部门转移到非国有部门。有些是转移到乡镇企业。虽然人员数量不大，但带去了技能、技术和管理经验，对后者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上述大规模的生产要素重新配置明显地是制度变革的结果。改革以前，在计划体制的框架下，生产要素被强制地约束在特定的生产部门，包括集体农业和国有工业。市场化的改革后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农村人民公社制度被放弃，妨碍要素流动的各项政策逐步改变，要素市场逐步形成，使劳动力、资本、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有可能按照市场所指示的要素边际生产率在部门之间重新进行有效配置，因而推动了生产率的提高。

### 要素再配置是加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

过去多数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着眼于改革带来的效率提高。这些研究发现改革期间农业和工业部门都有明显的生产率提高；其中有些研究还发现了效率与改革相关的明显证据；如农业生产率提高与包产到户改革的关系（见 Lin 1990），工业生产率提高与非国有工业部门发展的关系（见 Jefferson, Rawski and Zheng 1992, 等等）。

但近年来几项研究提出了新的证据，证明改革中造成了资源在不同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是生产率进步的主要原因。Woo（1996）计算了城乡之间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世界银行（1996）根据一项大致的计算认为，劳动力在部门间的再配置在 1978-1995 年期间提高了经济增长率 1.5 个百分点。蔡昉、王德文（1999）使用同一方法得出，1982-97 年间这一贡献为 1.6 个百分点。蔡昉等还认为其余的生产率进步因素已经微乎其微，仅 0.3 个百分点。王小鲁（1999，另见 Wang 1997）认为制度变革带来的劳动力再配置会进一步导致资本等要素的再配置，从而放大这一效应。通过两部门计量模型方法得出，仅农村经济中劳动力和资本从农业转向乡镇企业部门的再配置过程就导致了 1.4 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加速（1981-92），高于其他因素导致的生产率进步幅度（1.2 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到后者中还包含了城市经济中要素再配置的贡献，那么技术进步和企业微观效率提高的因素贡献是相当有限的<sup>6</sup>。农村劳动力的再配置在 90 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放慢甚至倒流的趋势，故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 1978-1998 年期间可能低于 1.4 个百分点，但估计仍有 1.2 左右。

考虑到从农业向非农业、从乡村向城市、从非国有企业向国有企业的劳动力转移，同时考虑到由此进一步带来的资本和人力资本转移，我们可以大致估计，改革 20 年期间，由于部门之间要素重新配置带来的生产率上升，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在 1.5-2 个百分点之间；是促成经济高速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迄今为止，企业微观效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是次要的。

改革期间企业微观效率的提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1、技术进步，2、市场化带来的竞争和开放提高了生产者的激励机制，从而提高了企业的效率。国内外许多研究者认为改革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在某些部门、某些时期提高了 1—2 个百分点左右<sup>7</sup>。在有些情况下这不但包括了以上两种效应，实际上还包括了资源配置效应。

<sup>6</sup> 但在某些时期、某些部门，微观效率的提高起了主要作用。例如 80 年代初期农村包产到户的改革曾在几年内大幅度提高了农业生产率。

<sup>7</sup> 如 Chen et al 1988, McMillan, Whalley and Zhu, 1989, Lin 1990, Jefferson, Rawski and Zheng 1992, Drysdale, Kalirajan and Zhao 1995, World Bank 1997 等等，多数是对农业或非国有工业部门所做。

## 要素配置效应的下降与剩余潜力

目前要素重新配置的作用正在下降。农业劳动力向乡镇企业的转移自 1997 年开始停滞甚至倒流。城乡劳动力流动受到了城市容量的限制和城市失业增加的压力。国有企业向非国有企业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转移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后者景气程度下降的影响。今后数年中, 如果不出现新的经济增长点, 前面所说的资源配置效应将在很大程度上不复存在, 经济增长将受到严重影响。

出现上述情况, 并不意味着资源配置效应的潜力告终。今后要素重新配置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应当说还有很大潜力。这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尽管已经有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领域, 但由于人口增长, 留在农业领域的劳动力还有近 3 亿人, 同改革开始时差不多。农业和非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仍然有巨大差异, 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是一项潜在的巨大资源, 需要寻找新的转移方式。

二, 国有企业目前正面临结构调整需要。目前国有经济部门仍然拥有整个经济中多一半的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源, 优于非国有企业平均状况的技术装备水平, 和 8800 万训练有素的职工队伍(下岗人员除外, 见国家统计局 1999), 但仅仅提供了约占 GDP 总量 1/3 的产出。大量国有企业经营不善、亏损严重, 资源严重浪费。对于那些不能改善经营、扭转局面的, 有待进行人员分流、资产重组, 优化资源配置。

上述这两方面的增长潜力由于受到体制、政策、市场环境等方面的约束, 还没有发挥出来。因此, 今后通过体制改革、政策调整和改善市场环境以优化资源配置, 仍非常重要。

## 2. 城市化与经济增长

我国的城市发展方针是“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 合理发展中小城市, 积极发展小城镇”。改革以后由于 1 亿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就业, 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城市化的发展。到目前为止, 城市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只有 30%。按常规汇率计算和按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计算(世界银行, 1997), 中国城市化水平分别低于同等人均收入水平国家平均水平 12 和 21 个百分点。1996 年在 3.6 亿城镇人口中, 有 1.5 亿居住在平均规模不到一万户的建制镇, 1 亿居住在平均规模 18 万人的 588 个中小城市, 其余 1 亿人住在 50 万人以上规模的城市。人口在 100 万以上的大城市只有 34 座, 有 7300 万非农业人口, 仅占全国人口的 6%(见王小鲁、夏小林的专题报告:《城市化与经济增长》, 1999)。

国际经验证明, 城市、特别是规模较大的城市, 会产生明显的聚集效应, 从而带来更高的规模收益、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强的科技进步动力、和更大的经济扩散效应。城市化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最重要方面。城市, 特别是大城市的发展, 在我国还有极大的空间。特别在农村工业化趋势已经减弱的今天, 通过城市化发展经济势在必行。

### 关于限制大城市发展的讨论

一般认为需要限制大城市发展的主要根据是: 1、大城市会带来较高的外部成本, 如环境污染、交通拥塞、居住拥挤、和昂贵的地价, 还会占用大量土地。2、大城市需要巨额基础设施投资, 对政府财政是沉重负担。3、发展大城市会使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 形成贫民窟, 带来高失业、高犯罪率等社会不稳定因素。4、相对于大城市而言, 小城镇有廉价的土地, 便于现有的乡镇企业逐渐集中, 有利于农村工业布局的调整。

以上看法是不全面的。大城市确实外部成本较高, 但规模合理的大城市有良好的聚集效应, 由此带来的规模收益可以远远超出外部成本, 经济效益远高于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交通和污染问题主要取决于城市的规划和管理。在一定意义上, 城市地价昂贵正说明城市具有良好的聚集效应, 能够对投资提供更高的回报, 才导致了对市区土地的强烈需求。

就占用土地资源而言，认为小城镇比大城市节省土地是一种误解。按人均占有的建成区（指公用设施达到的建筑密集区域）面积计算，我国 20 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人均占地是 200 万人以上大城市的两倍，建制镇人均占地是后者的三倍以上。过度发展小城镇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而土地资源非常稀缺的国家来说，代价会非常巨大。

关于大城市建设的巨额投资，只要城市具有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会得到充分的回报。问题在于改变过去只管花钱不考虑回收的投资方式，设计合理的资金回流机制，并更多地吸引民间投资。扩大城市建设投资还将增加有效需求，带动经济增长。

关于人口流动问题，我国至今还有 70% 的人口是农村人口，由于过去的城乡隔离政策，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今后农村人口进城是不可避免的。限制城市化只是积累矛盾，不是解决矛盾。城市化会在一定时期内部分地把过去的隐性失业变成显性失业，把城乡收入差距变成城市内部不同人群间的收入差距。但从更长期的眼光来看，加速城市化将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导致收入水平的更快提高，缩小城乡差别，有利于社会稳定。统计证明，我国 200 万人以上的大城市第三产业就业比重高达 45%，而 20 万人以下的小城市只有 23%。发展较大城市将意味着第三产业的重大发展和就业机会的大量增加。

小城镇建设对带动农村地区的发展，改善乡镇企业过于分散的布局有重要意义。但小城镇产业聚集效应弱，吸引力有限，不能以之代替大中城市的发展。小城镇建设也应当同大城市的布局和调整结合起来，并着眼于未来的规模扩大。

过去 20 年，乡镇企业的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低技术的乡镇企业发展空间正在缩小，对劳动力的吸收也已明显减弱。目前我国经济正面临结构调整的重大挑战，需要大幅度提高技术含量和进行产业重组。相当一部分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进行技术改造、规模重组和产业转移。小城镇不足以满足这一结构重组的要求。大城市则比较容易提供企业进行调整所需要的技术、信息、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市场等条件，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今后发展具有规模效益的城市经济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 **关于优化的城市规模**

为了研究合理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有必要把城市的正、负外部效益包括在内，对不同规模的城市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根据王小鲁和夏小林（1999）对全国 600 多座城市 1989-1996 年数据的模型分析结果，城市的经济效益和外部成本都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显著上升。城市的外部成本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表现在相对于产出而言较大的财政支出（例如用于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维护、公共管理，以及居民生活补贴、污染治理等的开支）；也加重居民的个人负担，如较高的生活费开支、由环境污染引起的较大健康损失和较高医疗费用等。

在对由政府和个人负担的外部成本都做了充分扣除之后，模型分析的结果证实，城市大致在 10 万—1000 万人规模区间都有正的净规模收益。在 100-400 万人之间时城市的净规模收益最大，约为城市 GDP 的 17%-19%，此后逐步下降。因此 100—400 万人的城市都可以称为最佳规模的城市。增加这一规模的城市将会大大提高经济效益，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考虑到城市发展的动态过程，留出余地，政策考虑的重点应当是促使一些有条件的中小城市发展成为 100-200 万人的城市。不过，恰恰是这一最佳规模区间的城市，在过去若干年中是增长最慢的一组。在 1989-96 这 7 年间，全国城市数量增加了 50%，城市人口增加了 42%，而 100-200 万人城市数量和人口仅分别增长了 10% 和 16%。这说明目前的城市政策体系不利于最优规模城市的发展。这种城市发展格局需要改变。

### **城市化的政策考虑及对经济增长的带动**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看，城市发展政策需要进行较大的调整，从重点发展小城镇转向发

展较大规模的城市,政策鼓励的重点应放在发展 100-200 万人口的大城市。对个别超大城市重点放在调整城市的产业结构和布局,改善基础设施,提高城市的经济效益。城市的功能-结构改善了,其规模效益可能进一步增加,而外部成本则可能下降。

加速城市化建设要在市场导向下进行,改善市场环境,促进要素流动和资源重新配置,并尽可能将外部成本内部化,例如减少政府对公共设施和稀缺资源(如水)的价格补贴,提高公共设施投资的可回收性,减少由于政府补贴产生的额外吸引力。

加速城市化建设要与现有产业结构的调整、技术改造和重组,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开发相结合。产业结构调整也需以城市为依托,和城市化战略结合进行。为此要有更加开放的政策,鼓励市场导向的产业重组、跨地区投资和兼并,打破地方隔据,减少行政干预。

设想如果在 2000-2010 年间城市化的速度(按城市非农业人口增长计)从 90 年代的平均 5%提高到 6.5%,而且城市化进程主要集中在规模优化(100-400 万人规模)的城市,这将在今后 10 年间至少吸收 1.1 亿农村劳动力,显著提高经济效益和生产率水平,还将通过城市建设投资带动有效需求。据计算,几个因素相加,可能提高经济增长率 2.4 个百分点,扣除增加的城市外部成本后净贡献于经济增长 1.7 个百分点。通过合理的政策调整和市场引导,加速城市化建设完全可能成为今后 10-20 年中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带动因素。

### 3. 需求结构变化与增长方式转换

在 20 世纪即将结束之际,我国经济出现了需求疲软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这仅仅是一个暂时现象,还是会在中长期影响经济增长?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对改革 20 年来的需求变化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改革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一直伴随着旺盛的市场需求。这主要是由几个因素决定的:

一,改革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大量资源根据当时的工业化战略投入到生产资料的生产,产品按计划调拨,不受市场约束。同时消费品生产严重不足,品种单调,设计落后,许多产品供不应求。改革以后,资源在市场导向下自然地转向消费品及其相关的生产领域。中国经济发生了从“政府需求依赖型经济”到“市场需求依赖型经济”的转变(见贺力平的专题报告:《国内市场需求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1999a)。尽管当时首先对市场需求作出反映的是低技术、劳动密集、粗放经营的乡镇企业,但它们或者没有竞争对手,或者竞争对手只是对市场反应迟钝、不讲效率、缺乏动力的国有企业。面对一个处处是空缺的市场,生产得以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了高速增长。

二,改革初期农民收入迅速提高,随后城市居民收入也很快上升。接踵而来的需求拉动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附加的动力。消费需求的上升最先集中在食品和衣着,随后转向自行车、缝纫机、电风扇、手表等普通耐用消费品。随着收入提高,又进一步转向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见贺力平 1999a)。这一浪接一浪的需求扩展,为拉动经济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经济高速增长又反过来成为居民收入增长的源泉。

三,渐进式的对外开放,一方面为国内居民提供了消费示范,另一方面给了国内生产者学习、引进、模仿和再开发的时间和机会,使之不但没有被进口产品挤垮,反而能够在不少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形成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不过,上述局面目前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首先,经过前一阶段的市场化改革和经济高速增长,消费品供给短缺的时代已经结束,全面的市场竞争时代已经来临。改革期间各种热销产品生产能力迅速扩张,远远超过了需求扩张的速度。目前不仅食品、衣着、日用消费品和普通耐用消费品,而且象高档家用电器、汽车等新兴产品,市场也面临着全面饱和。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1995 年 104 种主要工业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达到 80%以上的只占 30%(主要是一部分能源和原材料);生产能力利用率在

50-80%之间的占 46% ;生产能力利用不到一半的占 24%。短缺拉动高速增长已被市场饱和替代。由于没有较近的生产能力利用率统计资料,表 3.1 使用 1997 年部分工业产品产量与重点工业企业生产能力之比来与 1995 年生产能力利用率相比(这一比值应大于或等于生产能力利用率,因为通常还会有大量非重点企业生产同样的产品)。即使如此,还是有若干产品的该指标低于 1995 年的生产能力利用率。这说明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在这两年中更加严重了。

**表 3.1 企业开工不足趋于严重**

|       | 单位 | 97年产量 | 97年产量/重点企业生产能力 | 95年生产能力利用率 |
|-------|----|-------|----------------|------------|
| 彩电    | 万部 | 2711  | 53.5%          | 46.1%      |
| 微机    | 万部 | 207   | 51.5%          |            |
| 微波炉   | 万台 | 432   | 49.8%          |            |
| 空调器   | 万台 | 974   | 29.4%          | 33.5%      |
| 电风扇   | 万台 | 8171  | 61.7%          | 65.1%      |
| 电冰箱   | 万台 | 1044  | 40.5%          | 50.4%      |
| 洗衣机   | 万台 | 1254  | 49.9%          | 43.4%      |
| 自行车   | 万辆 | 2999  | 47.8%          | 54.5%      |
| 汽车    | 万辆 | 158   | 65.8%          | 44.3%      |
| 啤酒    | 万吨 | 1889  | 70.3%          | 73.5%      |
| 白酒    | 万吨 | 782   | 65.4%          | 64.9%      |
| 机制糖   | 万吨 | 702   | 68.3%          | 56.7%      |
| 合成洗涤剂 | 万吨 | 280   | 60.3%          | 53.8%      |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8（472-473 页）、1997（454 页）、《中国工业统计年鉴》1998（75 页）计算。

其次,80 年代收入大幅度增长(特别是在农村)的改革效应,潜力已经释放得差不多了。市场饱和又阻止了工业继续以 80 年代的速度增长,并且连带影响到农业和第三产业的收入增加。因此,收入提高拉动经济增长的力度也减弱了。

第三,由于收入差距扩大,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缓慢而无力带动消费增长,高收入阶层边际消费倾向减弱。过去改革期间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消费需求拉动和由消费牵导的投资需求拉动。这种消费带动型的增长已经改变。目前需要有强有力的新增长点带动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和消费提高。80 年代后期以来,几千万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对原有农村居民的收入提高起了相当的作用。但相对于我国众多的人口来说,现有的城市,特别是具备一定规模的城市容量有限,数量不足。加速城市化建设将会提供更多的空间吸收农村人口,对低收入阶层提高收入和消费将起到重要作用。

第四,我国已经有相当数量的人口跨过了温饱型的消费方式,转向较高的消费层次。这部分需求与我国目前居主导地位的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供给结构不相吻合,因此在相当程度上带动的是进口。同时,我国对外开放程度日益扩大,如果加入世贸组织势必进一步减少进口的阻力。这种需求与供给间的结构错位可能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进一步衰落,意味着低技术、粗放管理,仅靠非国有企业的体制优势平面扩张式的增长方式已经走到尽头。即使是过去经营成功的乡镇企业和其他非国有企业,也必须迎接结构调整、管理入轨、产品更新、技术换代的挑战。这需要大量人力资本和科技投入。

综上所述,目前的需求疲软尽管是短期现象,又有着中长期的意义。它说明过去 20 年来经济超常增长的条件已经改变,我国经济增长的方式面临转换。因短缺时代结束导致的消费品需求增长放慢趋势是无法改变的。居民收入提高的速度又依赖于产业的增长速度。因此问题的关键就落在产业的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进程,能否满足变化着的需求结构,以及能否



以更强的竞争力扩大在世界市场中的份额。

开拓新的需求领域也将有重要的意义。与世界同等人均收入水平的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目前第三产业的发展程度相差很远。这主要是城市化程度过低、和城市规模过小造成的。我国目前城市化水平只有 30%，近一半城镇人口又集中在小城镇，没有足够的市场发展第三产业。提高城市化程度将有效地扩大对第三产业的需求。

#### 四、环境篇

本篇讨论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包括国际经济环境、宏观政策环境、以及经济增长的社会环境。

##### 1、国际环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中国经济的迅速国际化是过去 20 年伴随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显著结构性变化。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1978 年的不到 5% 上升到了 1997 年的 20%。最高时达到 23%（1994 年）。在 1978-1997 年间，中国商品出口按美元计算，年均增长率为 16.7%，在同期世界各国中是最高者。中国出口商品的构成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工业制成品占全部出口商品的比重在 1997 年达到 86.9%，而 1980 年水平仅为 12.4%。从 1981 年到 1997 年，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占中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从 10% 上升到 41%（见贺力平的专题报告：《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1999b）。

对外贸易高速增长是改革和开放的结果，是实行市场导向和出口导向政策的结果。这极大地发挥了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改善了资源配置状况，对经济增长是有力的推动。特别是进入 90 年代以来，外贸由逆差转为顺差，到 1997-98 年，年顺差高达 400 亿美元。在国内需求不振的情况下，净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直接带动因素。

由于国际市场竞争加剧、亚洲各国货币贬值、发达国家贸易保护等原因，出口增长自 1998 年以来已进入停滞。即便不考虑上述短期因素，从中长期来看，今后出口增长也将受到世界市场扩展速度的制约，不大可能保持前 20 年的速度。在 2000-2020 年期间，比较可能的是出口保持与 GDP 大体上同步，以平均 6-8% 的速度增长。如果按各 8% 的速度增长，到 2020 年我国出口占世界总进口的比重将可能从现在的 2.8% 上升到 8.6%，高于日本目前在世界市场上的比重（贺力平 1999b）。

改革期间，特别是 90 年代以来，外资的大量流入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的经济格局。从需要的角度讲，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资金依赖主要有三个理由：“国际经营和销售差距” – 前者拥有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但缺乏国际经营和销售技术与网络，因此需要借助外国资本帮助开发本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以推动出口扩张；“技术差距” – 前者需要拥有先进技术和经验的外国资本和企业进入，为国内生产者提供示范和带动作用；“国内储蓄差距” – 在一定经济增长阶段上的发展中国家可能面临国内储蓄不能满足国内投资需求的制约，因此需要以国际资金弥补。对我国来说，由于储蓄始终保持高水平，因此起主要作用的是前两种因素（贺力平，1999b）。

在 1986-1997 年期间，外商投资企业年度出口额从 5.8 亿美元增加到 749.1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 55.6%；同期中国国内生产者出口额从 303.6 亿美元增加到 1077.9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 12.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9.9%）。很明显，中国商品出口总额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由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增长所带动。到 1997 年，外商投资企业占中国出口的 41%，占工业品国内市场销售额的 13.5%。因此可以说外资企业对于缩小我国的国际营

销差距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国内市场上,外资企业的竞争无疑给国内企业带来了威胁,但同时也给它们带来了竞争的压力以推动它们提高效率,并且也在技术和管理方面产生了示范和扩散效应。这对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有重要意义。总之,外资投入对中国经济明显利大于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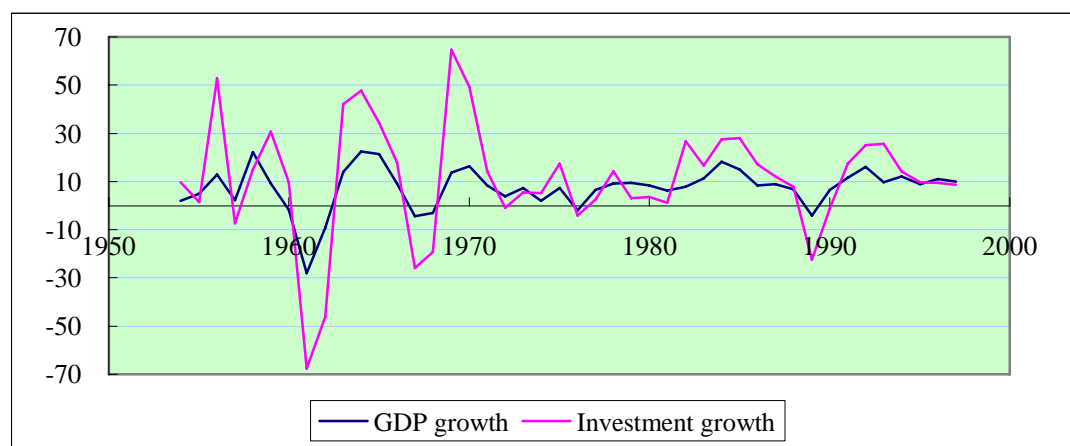
近两年来,外资投入明显趋缓。这有国际经济状况和投资格局变化的影响(包括世界市场上国际直接投资的主导方式已经转为跨国企业并购,而中国目前尚不能适应这一形势),也有国内市场竞争加剧、需求不振的影响(包括过去多年中已有大量外国直接投资进入中国,新的加速增长越来越困难)。因此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外资投入增速可能放慢,转向常规增长的局面。它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会下降。同时,外资投入的速度也取决于国内进一步开放和国内市场环境改善的力度。这包括提高政策与市场的吻合、政策的一致性和透明度,制止非税摊派和不适当的政府干预,消除政府腐败和提高政府效率等。

我国经济今后仍需要继续走向国际化。“循序渐进的市场开放有可能帮助缩小国际差距并推动国民经济增长”,这已为我国过去的经验所证明。但在一定时期内,如果国内市场以“大爆炸”方式对外开放、国内经济政策急剧调整、国内企业缺乏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和相应准备,全球化和市场开放的积极效应不仅可能表现不出来,而且还有可能出现严重的消极效应,一些国内产业甚至可能遭受巨大冲击而一蹶不振。俄罗斯等国家在这方面的教训是深刻的。

## 2、宏观政策与经济稳定增长

改革期间经济高速增长,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大体维持了经济稳定运行,避免了象改革以前那样的大起大落。从图 4.1 可以看到,改革以前的经济波动幅度明显大于改革以后的经济波动幅度。改革以前的经济增长率低,与这些波动关系很大。

图 4.1 改革前后的经济增长与波动



注:粗线为 GDP 增长率,细线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改革前根据国有经济投资推算),已扣除价格变动因素。使用了投资品价格指数为平减指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8、《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97。

尽管如此,改革期间的经济波动还是对增长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其中较明显的是 80 年代初由于大幅度压缩基本建设投资造成的增长率下降和随后而来的 1984 年经济过热,以及 1989-90 年紧缩引起的经济滑坡和随后而来的 1992 年的高速增长。从表面上看,这两个时期(1981-84 和 1989-92)的平均 GDP 增长率分别达到了 10%和 7.7%,还是处在相对比较理想的增长率范围,但实际上这两个时期都发生了大量的资源浪费,造成了实际产出的损失。

以 1989-92 年为例，如果我们假定当时的潜在最大增长率就是 7.7%，而宏观控制使增长平稳地保持在每年 7.7% 的速度，那么在此期间就可以达到更高的产出水平。尽管平均增长率相同，而且最后在 1992 年总产出水平达到了同样的结果，但实际上在 1989-91 年间因经济波动累计损失 GDP 达 2800 亿元，相当于 1989 年 GDP 的 18.7%（见表 4.1）。这些损失的产出本来可以用于增加居民消费和投资，从而改善今后经济增长的条件。

**表 4.1 1989-92 年期间经济波动的损失** 单位：亿元，1989 年价格

| 年份             | 实际增长率 (%) | 潜在增长率 (%) | 实际 GDP | 可能达到的 GDP | 损失    |
|----------------|-----------|-----------|--------|-----------|-------|
| 1988           |           |           | 14930  | 14930     | 0     |
| 1989           | 4.1       | 7.7%      | 15540  | 16080     | -540  |
| 1990           | 3.8       | 7.7%      | 16130  | 17330     | -1200 |
| 1991           | 9.2       | 7.7%      | 17610  | 18670     | -1060 |
| 1992           | 14.2      | 7.7%      | 20120  | 20120     | 0     |
| 平均增长率          | 7.7%      | 7.7%      |        |           |       |
| 累计 GDP(89-92)  |           |           | 6940   | 7220      | -2800 |
| 相对损失(1988 GDP) |           |           |        |           | 18.7% |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8 计算。

改革期间，在宏观调控方面有许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参见张小晶的专题报告：《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稳定增长》，1999）。例如 1981 年对基建投资“砍”得过猛；1984 年的信贷失控和 86 年放松信贷力度偏大；1988 年价格改革“闯关”给老百姓带来的通胀预期；1988 年第四季度持续到 1989 和 90 年的过度紧缩。近年来，宏观控制逐渐走向成熟。自 1993 年又一次经济过热后，适度的紧缩政策使经济在 1996 年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不过，在这方面也不是没有教训。主要表现在 96 年景气状况已开始转冷时，紧缩性宏观政策没有适时转向，加重了 1998-99 年启动有效需求的困难

认真总结过去宏观调控的经验教训，提高调控的预见性、调控力度和手段选择的科学性、对经济形势判断的准确性、和对经济活动主体（企业、居民、某种意义上也包括地方政府）行为方式的认知，对于保证今后经济稳定增长，是非常重要的。

正确的宏观调控，还必须建立在准确的经济信息之上。虚假的统计指标极有可能将宏观决策误导到错误的方向，酿成大患。我们不能不说，在过去几年中对经济形势判断欠准确，与统计指标失实有非常大的关系。这在当前和今后，都仍然可能是严重危害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危险。

### 3、增长边界——经济与社会稳定

社会稳定是经济增长的保证。过去 20 年，结束阶级斗争，经济迅速发展，以及渐进的、照顾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改革政策，使社会保持了基本稳定。特别是农村改革和农村工业化、以及开放城乡劳动力流动，使农村人均收入有了较大的提高，贫困人口大量减少，使社会总体稳定程度超过了改革前。但是近年来，不稳定因素有上升的趋势。社会不稳定因素如果积累到某一临界值，有可能发生突变而导致经济增长断裂。下面我们考虑几个重要的方面（见周天勇的专题报告：《中国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持续增长》，1999）：

#### 金融风险

20 年来，金融改革相对滞后。尽管已经出现了国有、非国有、和外资银行之间的竞争，

但四大国有银行目前仍占有垄断地位并且没有完全商业化。一个有健全竞争机制的金融市场还没有形成。这种滞后在一方面避免了类似俄罗斯那样的金融动荡对经济的冲击,另一方面因为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体制问题迟迟未能理顺,导致现有国有银行体系中不良资产的大量积累,因而造成越来越大的潜在风险。目前来看,银行坏债尽管数额巨大,但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已经临近金融危机的边缘。今后一段时间内仍可保持经济的稳定,使经济增长不被金融危机所打断(见樊纲关于综合负债率的讨论,1999)。但是如果这种潜在风险继续增长加重,迟早可能危及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金融改革也带来风险。目前和今后的主要危险在于:地方金融机构和农村各类基金会因管理不善造成的不良资产和兑付困难,资本市场上由于行政审批、编造利润业绩等造成垃圾股资产,和保险公司由于管理不善、费用开支过大导致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障基金的后期待付亏空。目前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相当严重(周天勇 1999)。

有问题并不意味着应当停止改革。金融改革必须审慎而持续地进行。困难的问题在于坚持优胜劣汰,促成那些业绩良好的金融机构发展壮大。我国在今后几年里,必须花大力气认真解决金融资产的质量问题,否则将有可能面临重大的金融市场混乱,危及经济增长。

资本市场的过早开放也会带来风险。这已经被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所证明。但是审慎而有限度地引进国际金融资本的竞争,可以给国内金融市场带来急需的管理经验和竞争压力,促进国内金融机构素质的提高。

### **失业增加**

近年来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大量增加,使实际失业人数迅速上升。1998年与1996年相比,国有企业就业人数从1.12亿下降到9000万。下岗人员扣除再就业部分,加上登记失业,估计使实际城镇失业率达到8.5%,加上潜在失业,可能达到13%。这个数字今后几年中还可能继续上升(周天勇 1999)。今后能否使失业率不超过危及社会稳定的临界点,主要取决于能否避免经济萧条和能否保持非国有企业继续发展以吸收社会劳动力。

就业压力的另一方面是乡镇企业发展停滞。乡镇企业就业近年来有萎缩的趋势。人口抽样调查数字显示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在1997-98年持续下降(但包含了统计口径调整的因素,待核实)。这大大增加了农村劳动力剩余的压力,也会导致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一项估计认为,按目前的农业生产率条件和农作物播种面积,1997年农业部门实际只需要1-1.3亿劳动力,因此还有约2.1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周天勇 1999)。这项估计未考虑林、牧、渔业劳动力需求,也未扣除已经转移到城市经常性或临时性就业的几千万“流动人口”。尽管如此,农村还有大量剩余劳动力仍然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使用经济学的概念,我们可以把剩余劳动力定义为其边际劳动生产率低于其实际收入的那一部分劳动人口。农村劳动力吸收停滞将拖累经济增长并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今后一个时期不能对乡镇企业的发展抱有过的期望。因此加速城市化发展将是一条扩大城乡就业的势在必行之路。

### **收入差距扩大**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虽然人均收入水平大大提高,然而收入分配差距也在扩大。这包括地区间、城乡间、城镇居民内部和农村居民内部各阶层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周天勇 1999)。

在地区差距方面,省际人均GDP标准差在1978-1990年间增加了1.1倍,1991-1996年间增加了1.6倍。相对而言,地区差距比社会阶层差距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可能要小一些,但应当看到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与高收入地区的差距过度扩大将有可能导致分裂倾向和突发性民族事件等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

在城乡收入差距方面,改革初期阶段趋于缩小,城乡人均收入之在1978-1984年期间从2.57缩小到1.71,但以后转向扩大,到1998年达到2.51,接近改革前的相对水平。

城镇和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更为突出。90年代中期，城镇居民收入吉尼系数按不同计算在0.31-0.43之间，农村居民收入吉尼系数在0.33-0.44之间（国家统计局1995，世界银行1994，人民大学1994；见周天勇1999）。城镇居民中已有约200万个家庭具有百万元以上资产。另一方面城市中由于失业、下岗、长期拖欠工资、养老医疗得不到保障等原因出现了城镇贫困阶层，1998年困难人口达1900万。农村中的贫困人口虽然大幅度减少，但农村收入增长的空间缩小，自然灾害和各种税费负担过重等问题不容低估。估计1998年农村贫困人口约为6000-7000万。目前就一些金融机构的典型调查看，80%的储蓄存款掌握在20%人的手中。根据国家体改委对城镇居民的一项调查，1998年对贫富差别不满意的占77.9%，是各项调查项目中不满意度最高的一项。

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在地区、城乡、特别是不同阶层之间形成着一种心理上的不平衡，尤其是在民族地区和城镇及农村的最低收入阶层中比较严重，是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

### 吏治和司法腐败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中国吏治和司法也在一定程度上染上了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中的腐败病症。国家公务人员贪污、受贿、索贿、参与走私等案件越来越严重。1982年涉及干部经济犯罪案件，立案164000件，追缴赃物3.2亿元。1995年立案155485件，追缴赃物66.8亿元。其中涉及县处以上官员5千余人。建设项目中采购和招投标的徇私舞弊等党政官员腐败现象还导致了大量投资失误，造成的巨大损失要远远超过单纯的贪污浪费。干部选用制度上也存在缺陷，形成买官、贿选等用人腐败问题。在山西吕梁地区一次民意调查中，18000张问卷中，有94%的人认为，最大的问题是用人不公（周天勇1999）。

司法腐败，包括滥用职权、违法办案、以权谋私、以案索贿等等是近几年社会各界反应较强烈的问题。1998年，立案侦察的司法和行政执法人员索贿和徇私舞弊5811件，7067人，国家机关人员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犯罪1467件。个别司法人员与地方恶势力勾结一起，给司法公正形成更大的危害。

根据国家体改委课题组的调查结果，对不依法办事的不满比率高达64.9%。这些问题如不及时制止，会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司法和行政执法腐败迟迟得不到控制，说明缺乏必要的民主监督机制。在这方面，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和新闻舆论监督非常重要。

部分国有企业领导的腐败问题也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这是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不善的重要原因之一。

腐败问题愈演愈烈，说明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提上日程。没有群众和舆论监督，行政和司法机关的自身监督和互相监督是远远不够的。

### 农民负担

由于各种人员、办公、罚款、种种税费和摊派无法降低下来，农民人均实际负担可能仍然占农民纯收入的7%-9%，超过中央规定的5%。有些地方的农民负担实际上还要重得多（周天勇1999）。

农民负担加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和基层行政机构的膨胀。1978年时，一个公社（相当于乡）的干部编制一般在8-15人，大队干部（相当于行政村）在3-5人，小队干部不脱产。到1998年时，一个乡镇的预算内编制加上需要农民负担的编制外干部通常在100-200人，多的达到400人；村干部达到20-50人。村民小组干部达6-10人，村和村民小组干部全部或部分由农民负担。

乡镇村除正常的办公开支和用于当地村镇建设、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开支，还常常有购买轿车、建设豪华办公楼等额外费用。乡镇和村两级还常常设有食堂并有专门的招待费用



以接待上级检查及应酬各方面关系。这些都要靠税外收费、罚款摊派来支付。这些给农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招致农民不满，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在某个临界点上，农村社会稳定状态有可能因此而发生突然变化。

以上各项，都是经济增长面临的风险，如果积累到一定程度，都有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危及经济增长。但其中危险性最大的是腐败问题和农民负担问题。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可能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

## 五、综述篇

### 经济增长率究竟有多高？

从 1978 到 1998 这 20 年间，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 9.7%，高于改革前的 1953-1978 年平均增长率 3.6 个百分点。但对于统计是否准确，有许多不同看法。国外一些研究多认为官方统计偏高。例如世界银行（1997）的研究结果认为 1978-1995 年的年均增长率应为 8.2%，Maddison（1998）的研究结果则认为同一时期的年均增长率应为 7.5%，均低于国家统计局的 9.9%。本课题所进行的一项初步研究发现，1978-1990 年间的增长率偏差不大，有可能偏高 0.5 个百分点。主要的偏差发生在 1991-1998 年期间。该期间的经济增长率可能高估了 2.2 个百分点。而同一时期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可能高估了 4 个百分点。如果对此进行修正，那么这 20 年的平均增长率应当是 8.5%（见孟连、王小鲁：《对中国经济增长统计数据可信度的估计》，1999。初步结果，有待进一步证实）。在对改革前时期和改革时期的增长率都进行修正后，后一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前一时期还是高出约 4 个百分点。改革促进了经济高速增长仍是一个不可动摇的事实。

但统计数据不真实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统计数据是宏观调控的依据，以此为前提进行宏观调控可能导致错误的决策。

### 要素投入和生产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

根据本文前面部分的分析，20 年改革期间，资本投入的增长对年均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约为 3.8 个百分点，比改革前加速了 1.3 个百分点（根据模型分析的初步结果，资本、劳动、人力资本的弹性值分别按照 0.4、0.4、0.2 计算）。其中储蓄率提高的因素带动了 0.3 个百分点，投资效率提高的因素带动了 0.7 个百分点，外资投入带动了 0.3 个百分点。尽管投资效率提高了，投资中的浪费仍然很大。今后进一步改革投资体制，提高投资效率，仍将是一个推动经济增长的潜在源泉。储蓄率在短期内仍将居高不下，中长期有可能下降。但投资效率如果能够有效地提高，将有可能抵消今后储蓄率降低给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将可能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保持在同一水平。

外资投入只在 90 年代后才有比较重要的影响。但其主要的贡献不在于增加资本投入，而在于推动生产率提高。外资投入增长的速度在今后一个时期可能放慢。

劳动力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约有 1.1 个百分点，加速部分 0.1 个百分点。

如果用新增从业人员中的大、中、小学毕业生人数作为衡量人力资本变动的尺度（按受教育年限加权），那么改革 20 年间人力资本存量的平均增长速度为 6.1%，大大低于改革前 12.8% 的增长速度。人力资本在改革期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初步计算为 1.2 个百分点，比改革前有明显的下降。

总体来看，改革 20 年期间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有 6.1 个百分点，基本上与改革前持平。这是因为资本投入加速的因素被人力资本投入减速所抵消，实际上并未对经济增长加速起作用。如果使用前面所述修正后的经济增长率（年均 8.5%）计算，在扣除了 6.1 个

百分点的要素贡献后,改革期间有平均 2.4 个百分点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这是经济增长加速的主要来源。

今后 10-20 年,在投资领域继续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将会明显改善投资效率,因而即使储蓄率下降,国内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有希望不下降,但外资贡献下降 0.1-0.2 个百分点。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将显著放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将只有 0.3 个百分点,比前 20 年减少 0.8 个百分点。这一贡献的下降希望能够大部分被人力资本的加速增长所补偿,因此人力资本积累将对经济增长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这取决于能否有效地加强教育事业、改善人力资源结构。在较理想的情况下,可以假定要素投入的贡献为 5.7%,仅下降 0.4 个百分点。

### **非国有部门与乡镇企业—资源配置优化带动的增长**

改革中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因素是非国有部门的快速发展。而直到 90 年代中期,该部门的主导部分一直是乡镇企业。这应当主要归功于改革期间农村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的优化配置,即大量从生产率极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市场导向的乡镇工业和农村的其他非农业部门。这种资源转移所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在 1.2 个百分点左右,占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一半。因此,在改革期间农村工业化是经济增长加速的主要源泉。90 年代中期以后乡镇企业增长放慢,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在 90 年代进展较快,有取代劳动力向乡镇企业转移的趋势。

资源在其他部门之间的转移(主要是在城市经济中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的转移)直到 90 年代初还比较有限,但近几年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城市非国有企业部门的规模仍然较小,不但同国有企业相比,而且同外资企业相比也是如此。

几个方面综合考虑,改革期间由于资源在部门之间的转移和优化配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在 1.5 个百分点以上,占了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部分。技术进步和企业微观效率提高的因素所剩不多(另参见蔡昉、王德文 1999,王小鲁 1999,世界银行 1996)。这说明改革期间的经济高速增长既不是象克鲁格曼所说的“投入带动型增长”,也不是主要由技术进步带动的增长。增长过程中确实伴随着明显的生产率提高。不过,由于这种生产率提高主要来自市场化改革引起的资源配置改善,因而是比较短期的因素。一旦实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这种高速增长的因素就不再起作用了。

因此,重要的问题在于:1)资源优化配置的潜力还有多大?2)在市场化带来资源配置改善的同时,是否同时也形成了促使技术进步和改善效率的激励机制和条件,从而为未来的长期持续增长创造了条件?

### **增长动力转换:从农村工业化到城市化**

目前沿海某些较发达地区的农村工业化已经经过了这种大规模资源重新配置阶段,优化配置潜力已经不大。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工业化程度低,劳动力过剩,资源配置仍然有很大潜力。但是这些地方的农村工业受到市场饱和、技术和人力资本稀缺、基础设施不足、体制环境欠佳等制约,很难再以过去的沿海速度发展。因此乡镇企业发展已不大可能继续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城市化发展严重不足,城市的规模效益远没有得到有效发挥。通过政策调整,加速城市化建设(特别是合理规模的大中型城市建设)完全可能取代乡镇企业的角色,吸收农村剩余资源,发挥规模效益,成为今后 10-20 年中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带动因素。

### **改革仍然重要**

目前虽然有部分国有企业发展良好,但大量国有企业因为体制、产业结构、布局等方面

的问题，严重亏损，不能正常经营，并形成了大量银行坏债，导致资源的大量损耗和无效占用。不少过去发展起来的乡镇集体企业现在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因此改革仍然是大题目。除了国有企业自身的改革外，很重要的方面是消除障碍，促进跨所有制、跨部门、跨地区的资源流动和优化配置。这方面，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和重新就业是资源重新配置，国有亏损企业的资产重组、兼并、转让、转制、引进外部股权，也是资源重新配置。

### **需求结构变化与增长方式转换**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短期的需求疲软现象。但这又有着中长期的意义。其一是短缺时代结束和国内市场全面竞争所导致的消费需求空间相对缩小，其二是改革早期的收入拉动效应大幅度减弱，其三是由于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缓慢而高收入阶层边际消费倾向减弱所导致的需求疲软。其四是一部分有购买力的高收入阶层需求结构发生变化，与目前国内居主导地位的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供给结构不相吻合，因此主要带动的是进口和外国投资。这些因素今后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经济增长。

今后拓展例如城市化建设这样的新增长点对于带动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至关重要。需求结构的变化也提出了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即使是过去经营成功的乡镇企业和其他非国有企业，也必须迎接结构调整、管理入轨、产品更新、技术换代的挑战。这意味着过去以数量扩展和价格竞争为主的增长方式面临转换，向提高质量、提高技术含量、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生产效率的增长方式过度。这个过程将需要大量人力资本、科技和信息投入。

### **技术进步与改善体制环境**

根据若干微观调查得到的资料看，90年代以来虽然企业面临着不少困难，但仍然可以看到技术进步（包括生产效率的改善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在一部分企业中加快的明显迹象。技术进步与外资投入有密切关系。这不止是由于外资直接带来新技术，也由于外资在技术、管理、体制方面对国内企业产生了示范效应。进出口的发展和国内外信息流通的增强也起了积极作用。在技术进步方面，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表现出明显较强的动力。但是国内民营企业的发展仍然面临不少障碍。表现在：

（1）融资困难。目前一方面银行资金过剩，但另一方面大量中小企业仍然很难得到资金支持，发展受到制约。

（2）环境不良。虽然对民营企业的政策限制已大大减少了，但政府机构臃肿低效导致摊派大量发生，工作人员腐败，执法人员违法现象日趋严重，对企业经营形成严重干扰。经济发展仍然受到体制方面的严重制约。

（3）缺乏知识产权保护。产品仿冒、技术流失现象严重，企业技术和新产品开发得不到有效保护，削弱了企业的技术进步动力。

（4）人力资本瓶颈。企业（特别是小企业）管理和技术素质太低，也是妨碍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说明与人力资本形成有关的教育、职业和专业技术培训急待加强。

只有在解决了以上瓶颈环节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才能得到保证。

### **社会稳定与增长边界**

未来经济增长将受到某些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挑战，主要是金融风险、失业增加、收入差距扩大、吏治与司法腐败。这些问题如果持续扩大，积累到某个临界点，就有可能打断经济增长的正常进程。特别是腐败问题，已经成为妨碍经济增长、激化社会矛盾的最主要因素。这些问题能否解决，是未来经济增长有无保障的一个关键因素。

### **增长前景**

今后 20 年对中国至关重要。如果中国经济增长能够保持在年均 6.5%，到 2020 年 GDP 总量将达到 1998 年的 4 倍，可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sup>8</sup>，人均 GDP 将达到 1998 年的 3.4 倍，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根据前面的分析，从要素投入的角度看，如果能够保持要素投入贡献保持在 5.7 个百分点，经济增长保持在年均 6.5% 的速度应当没有困难。这只需保持 0.8% 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就可以实现。但这需要有效地提高投资效率、并加速人力资本积累。

如果能够加速城市化进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仍然有希望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这对提高投资效率和加速人力资本积累，乃至消除农村贫困、提高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也都有重要的意义。

另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如何促进市场导向下的产业结构调整 and 以技术进步为主导的增长方式转换。不实现这种转换，低技术产品严重过剩和高质量、高技术产品供给不足的结构矛盾将无法解决，经济效率无法提高，预期的经济增长将无法实现。

为了实现这种增长方式转换，迫切需要改善市场环境，同时整治腐败，保持社会稳定。

如果以上几点都能够顺利实现，今后 20 年的经济增长完全有可能保持在 7% 甚至更高水平。

---

<sup>8</sup> 如果按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还将更高。

## 参考文献及资料来源：

- 科尔奈：《短缺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 劳动部就业司项目组：《机会与能力：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与流动》，铅印报告，1997，北京。
- 农业部：《中国农业发展报告》，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1996北京。
- 庚德昌等编：《农村居民经济行为和劳动时间利用调查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北京。
- 周其仁：《制度变革、结构变化和城市就业》，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1997-002，北京。
- 张二力、郭震威等：“我国中长期人口发展趋势预测”载《全国和分地区人口预测》，中国人口出版社，1998年。
-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历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
-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
-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1997，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大连。
- Chen, K.; Wang H.; Zheng Y.; G. H. Jefferson and T. G. Rawski, 1988, “Productivity Change in Chinese Industry: 1953-1985”,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2, 570-591.
- Chow, G. C. 1993, “Capital 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CVIII (3), August, 809-842.
- Drysdale, P.; K. P. Kalirajan, and Zhao S., 1995, “The Impact of Economic Reform on Technical Efficiency: A Suggested Method of Measurement”, *Pacific Economic Papers*, No.239, AJRC,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 Feder, G., 1983, “On Exports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2, 27-29.
- Garnaut, R., 1989, “China’s Growth in Northeast Asian Perspective”, *Pacific Economic Papers* No.167, AJRC,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 Garnut, R. and Ma G., 1996, “The Third Revolution”, in Garnaut, Guo and Ma (ed.): *The Third Revolu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efferson, Rawski and Zheng, 1992, “Growth, Efficiency, and Convergence in China's State and Collective Industr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Jan..
- Krugman, P., 1994,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73(6), November/December, 62-78.
- Lewis, W. A.,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XXII, May, 139-91.
- Lin, J. Y. 1990, “The Impacts of the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on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Dutta, Chang and Lin eds.,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open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in Asian Economic Studies*, vol. 2, Greenwich, Conn. And London, JAI Press.
- Lin, J. Y., Cai, Fang and Li, Zhou; 1996, *The China mirac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reform*, Hong Kong.
- Lucas, R. E., 1988,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 3-42.
- McMillan, J; J. Whalley and Zhu L., 1989, “The impact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7(4).
- Mody, A. and Wang F., 1997, “Explaining Industrial Growth in Coastal China: Economic Reforms and What Else?”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1 (2), 293-325.
- Rawski, T. G. 1986, “Productivity Change in Chinese Industry: Problem of Measurement”,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typescript.
- Romer, P. M., 1986,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 1002-37.
- Sato, K., 1966, “On the Adjustment Time in 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33, 263-68.
- Sato, R., 1963, “Fiscal Policy in a 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 An Analysis of Time Required for

- Equilibrating Adjustmen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30, 16-23.
- Solow, R.M., 1956,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0, February, 65-94.
- Stiglitz, J., 1996, “Some Lessons from the East Asian Miracle”,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11(2), August, 151-177.
- Tisdell, C.A., 1992, “Microeconomic Efficiency and Macroeconomic Policy Effectiveness in China’s Transformation Pha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19 (10-11-12).
- Wang, Xiaolu: “China’s Rural Econom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 Holding Capacity”, in Lo (ed.)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ramework of China*,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Tokyo.
- Woo; Hai; Jin; and Fan; 1994, “How Successful Has Chinese Enterprise Reform Been? Pitfalls in Opposite Biases and Focu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8(3), June.
- Woo, W. T., 1996,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Sources and Prospects”, manuscript, presented at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ugust.
- World Bank, 1985, *China: Long-Term Development Issues and Option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World Bank, 1980, 1993, 1996, 1997,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rld Bank, 1996, *The Chinese Economy: Controlling Inflation, Deepening Reform*, The World Bank publication, Washington, D. C.
- World Bank, 1997, *China 2020: Development Challenges in the New Century*, The World Bank publication, Washington, D. C.
- Young, A. 1995, “The Tyranny of Numbers: Confronting the Statistical Realities of the East Asian Growth Experi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0(3), August.
- Wang, X., 1997, “*What Contributed to China’s Rapid Rural Industrial Growth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 Ph.D dissertation,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Wang, X., 1997,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Rural Industrial Growth in China”, Discussion paper No. A-5, June 1997,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omplex Economic Systems, Kyoto University, Japan.
- Wang, X., 1993, “Modeling Growth Performance of China’s Rural Industry”, in *Chinese and East Asian Economies in the 1990s*,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Canberra.